

“躺平正义论”出自2021年年初社交媒体的一个热帖《躺平即是正义》(以下简称“躺平帖”)。虽然此前网络上“佛系青年”“躺平任嘲”“三和大神”之类的说法不无戏谑调侃甚至自嘲自黑之意,但对“躺平正义论”却



不能完全作如是观。原因在于,帖主依据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意识提出了一种以“低欲望、低需求、低消费、少社会关联”(以下简称“三低一少”)为主要特征的生存主张,这种主张迅即在网上激发出不少共鸣,以至于在众声喧哗中“躺平主义”仿佛构成了对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的一种消解,对某些领域过度竞争、严重内卷现状的一种抵制,甚至是对无序扩张的资本积累的一种反抗。虽然一再遭到主流媒体的臧否,但“躺平”无疑已经成为本年度炙手可热的流行词。躺平主义可以说正在形成一种亚文化,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网络世界。

“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这可视为“躺平帖”的核心论断。已经“躺平”两千多年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恐怕不会想到,其最著名的哲学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在当今中国网络上重获新生,居然同“躺平”关联起来,转

自我解构的躺平主义

——“躺平正义论”批判

王金林,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化为这么一个貌似深奥玄妙又切中时弊的新命题。躺平在此成为普氏命题成立的先决条件:人若要成为万物的度量衡,首先必须改变自身的“体位”。在自述近年来“少干多躺”的生活方式之后,帖主向世人透露了其间所蕴含的哲理:人之为人,端赖其主体性,并且这种主体性只有当人躺平时才能体现——躺平“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躺平正义论”之要义正在于此。有关躺平现象的争议亦与此息息相关。由此,本文将围绕躺平主义是否具有正当性、抵抗性乃至主体性展开讨论。

躺平主义是否具有正当性

肯定的观点通常以导致躺平现象产生的客观原因来论证躺平主义的正当性。这种观点诉诸当下的经济机制与社会结构分析,强调躺平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层的社会经济原因。其一,社会转型导致竞争加剧,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内卷现象,社会流动日益放缓,社会阶层逐渐固化,从而导致一些底层青年上升通道越来越窄;其二,有些资本无序扩张,对劳动力的盘剥愈发严重,对劳动者的权益愈发漠视,劳动者被当作“韭菜”收割;其三,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炮制出各种光怪陆离的需要,使消费者在不经意间沦为被消费品或消费的奴仆。针对这些社会现象,“躺平正义论”主张躺平,拒绝内卷,转而追求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这种主张虽然不无逃避现实不思进取之嫌,但从其产生背后的客观因素来看,也不乏正当性。

然而,问题在于,虽然躺平现象的产生不无客观原因,但躺平主义却并不能因此而理所当然地获得正当性。身处相同的社会结构与经济机制之中的人,完全可能有不同的抉择。躺平者往往缺乏自立自足的

现代意识，他们企图逃避竞争，得过且过，结果不仅不能如其所愿自在地生活，反而陷入了近乎放弃自食其力、独立自主的境地，而这显然违背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无助于个体与社会的发展。按照黑格尔法哲学的观点，现代社会成员有权利按照特殊性原则来满足自己的多样化需要，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但这只能通过普遍性的方式来进行，即只能通过满足他人需要与利益的方式来进行。因此，现代社会成员要实现自己的主观自由，有必要亦有责任把自己同某种职业关联起来，以便成为一个“人物”。黑格尔有言：一个不同他人发生社会关系的人谈不上是一个现实的人。马克思更是把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的普遍性视为人类真正的财富，虽然其在现代社会中是以异化的形式进行的。然而，躺平主义却反其道而行之，以为遗世独立的“三低一少”式生活方式就可以成就自我。这显然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觉”，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正当性。

躺平主义是否具有抵抗性

肯定的观点每每以资本机制与消费逻辑为批判的标靶，认为躺平主义具有抵抗色彩。躺平者通过抑制或减少物质需要和社会关联的方式，尽可能多地置身于现行生产与消费体制之外，尽可能少地参与社会生活。这种观点认为，如此这般的行动不仅可以逃避资本机制的盘剥与消费逻辑的算计，使得资本积累难以为继，而且可以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奠定基础。躺平者被认为类似西方当代激进思潮中的一个拒绝工作的典型形象，即小说人物巴特比。作为律所誊抄员，巴特比忽然有一天以“我宁愿不干”来回应老板的所有工作要求。齐泽克等西方激进思想家把这样一个人物构造成了抵制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典型，主张当代西方无产者应当采取诸如此类的行动，以解构现行生产关系。因此，“躺平式退出”被认为类似马尔库塞所谓的“大拒绝”，甚至直通哈特与奈格里所谓诸众的“出走”。

然而，从“躺平帖”的描述来看，躺平主义实质上只是一种边缘性的生存方式。躺平式地退出社会经济过程，与其说是自觉反抗，不如说是自甘边缘，不

仅不具有反抗性，而且难逃寄生性与依附性。原因在于，一方面躺平者一般并不拥有充分的生活资料，更不拥有必要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继续依赖现行生产与消费体系而存活，只不过其物质需求被人为地降至极低水平。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边缘性的生存方式，躺平主义很难普遍化，从而不可能在任何实质的意义上威胁到现行生产机制的运转，其对消费主义的抵制亦微不足道。因此，新的生产方式根本无从谈起。马尔库塞所谓的“大拒绝”——姑且不论其乌托邦性质——作为一种抵抗策略，是要同现行的一切彻底决裂，以便克服工具理性对人的本能的压抑。就此而言，躺平主义似乎同“大拒绝”不无相通之处。但是，这种相通终究只是形似而已，因为躺平主义根本做不到彻底决裂，并且其“三低一少”的生活方式只能说是对人的本能的另类压抑。另外，躺平式退出同哈特与奈格里所谓诸众的“出走”更是不可相提并论。诸众作为劳动产品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主体，其“出走”并非两手空空地离开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而是对现存生产资料的另一种占有，其间涉及对现行资本体系的颠覆。这种“出走”显然并非一种躺平主义。

躺平主义是否具有主体性

肯定的观点对躺平主义的主体性深信不疑。“躺平帖”明确高举人的主体性大旗，把晒太阳、思考逻各斯和躺平都视为人的主体性的某种体现。人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主张充满主体性。“躺平正义论”诉诸主体性，不正是其已经达到自主、能动与自由的自我意识的



证明吗？并且，就躺平的选择而言，它是具有自主性的。躺平也好，内卷也好，都属于个体自觉的选择。虽然这种选择有其产生的现实背景，涉及客观的社会结构因素，但毕竟是个人自主行为，不乏主体性因素。另外，从躺平的效果来看，它也可能为躺平者带来新的能动性，使躺平者从外在的贫困中获得内在的丰富性，在现行机制之外开创另一种属人的存在方式，而这不正是主体性的表现吗？

然而，躺平者貌似自主地选择了躺平，但仅靠这一选择本身，却难以确立人的主体性。倒不是说，这一选择完全受制于外在必然性，毫无主观自由，而是说这种主观自由恰恰违背了主体性的核心原则，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及其自觉。形式上的选择自主性，不能掩盖其所选择的内容实质上的被动性与消极性。无论是从生活方式来看，还是从生活内容来看，躺平者都因自绝于劳动分工与社会生活而极度贫乏。这种贫乏不仅表现在物质上，而且表现在精神上。从物质上看，躺平者通常只是勉强苟活；从精神上看，躺平者表面上自由，但其内心深受时潮之奴役。躺平者不过是以消极、被动与边缘的方式，反过来承认了潮流的支配地位，这同内卷似有相反相成之嫌。要紧的是，个体在躺平状态中并未获得自我充实，而是把自我虚无化，有从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的危险。因此，“躺平正义论”虽然表面上高扬主体性，但实质上却是自戕性的。

不过必须承认，“躺平正义论”呼唤人的主体性，这无疑抓住了时代脉搏，也是它引发大量同情或共鸣的真正原因。现代世界确实经常处于一种深刻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其核心精神主张主体性，另一方面其体系安排却经常违背

该精神。或者说，现代世界在理念上向人类的每个成员允诺了主体性，但其体系设置却未能为“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马克思语）提供必要的条件，结果导致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每每以另一些人的物化为代价。因此，“躺平帖”所谓“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的论断，虽然不无偏颇之处，却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从这个意义上讲，躺平主义确实触及了现代社会的某些痛处。然而，主张以躺平的方式来“体现”人的主体性，却纯属南辕北辙，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言，存在者只有以自己的双脚站立于大地，才是独立的，而人的独立性与能动性只有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才能得到体现。个体的独立性与能动性是人的主体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躺平显然与此相去甚远。躺平之行为本身恰恰消解了躺平主义所标榜的主体性。

关键在于，“躺平正义论”不明白，现代世界中人的主观自由或独立性，绝非脱离社会的特立独行，而是以市民社会的“需要体系”（黑格尔语）为前提的，或者说，是建立在商品、货币与资本这些“物的依赖关系”（马克思语）基础之上的。虽然在这些前提或基础上，人的主体性只能以异化的方式实现，但是其真正的实现却不可能跳过它们，因为这种实现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马克思对此富有洞见，认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只有亲身经历这样的社会历史进程，人才有可能在对象化的过程中获得自我确证。舍此，任何“体位”的调整都不可能“体现”人的主体性。

可见，“躺平帖”虽然引用了普罗泰戈拉的命题，却遗忘了它的后半部分，并未领会其真谛。不妨完整地重温一下普氏的教诲：“人是万物的尺度，不仅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而且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躺平距离不存在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躺平者坠入虚无。于是，追寻主体性的躺平主义便自我解构了，留下一片主体性的空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15ZDB013）成果。]